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宁波城市史

NINGBO CHENGSHI SHI

王瑞成 孔伟 著



NLIC2970753749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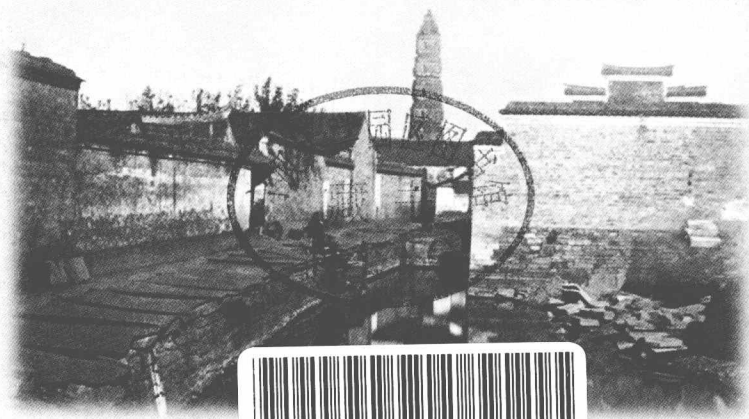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专门史研究

贈書

宁波城市史

NINGBO CHENGSHI SHI

王瑞成 孔伟 著



NLIC2970753749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城市史:王瑞成,孔伟著.—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743-668-3

I.①宁… II.①王… ②.孔… III.①城市史—宁
波市 IV.①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283 号

宁波城市史

作 者 王端成 孔 伟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印 刷 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20 千

版次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668-3

定 价 48.00 元

前 言

《宁波城市史》的研究对象是以今天宁波市所辖范围为基准,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的城市历史。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这一区域建置和名称不断变化,只是出于历史书写的方便,统以“宁波”命名,具体内容,当按历史实际表述。

而“宁波城市史”之“城市”也是一个历史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以港和城为中心来确定“城市”所指,外延则延伸到以港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和市镇体系。

城市个案研究或单个城市史编写,一般采用常规的架构,即纵向的发展演变过程,横向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化。

但笔者认为城市史编写,固然需要有基本的格式和内容,更需要抓住一个城市的个性和活的灵魂。无论是从城市史研究的学术拓展,还是从“宁波文化研究工程”这一主旨考虑,“宁波城市史”都需要有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和架构。而这一研究的突破首先是基于对城市,尤其是宁波这样的城市本质的重新认识。

“城市”作为人类基本聚落形态之一,与乡村不同。城市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处于更大的不同系统当中。一座城市之兴,有其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也有时和势的背景和条件,即外部环境和条件。城市自身内外环境和条件形成的系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便会造一座城市的兴衰起伏,我们称之为“一座城市的命运”。一座城市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又不可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变动的世界当中,城市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考察一座城市历史过程的重要视角。

宁波这座城市的历史特点就是:大起大落,生生不息。抓住了这一特点,就抓住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和基本问题。大起大落是其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生生不息是其城市精神的真实体现,而其中原委的追究,正可以揭示一座城

市历史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因不同原因兴起的城市,其命运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几类:一、都城和行政中心城市,因政治权力资源而兴起,受战争和王朝更替影响较大,有些甚至会彻底毁灭;二、因工商业而兴起的城市,最典型的是江南市镇,相对比较稳定并持续发展,只是在近代经济转型时期受到比较大影响;三、因矿产资源而兴的城市,与资源开采和资源储量命运相关;四、因内陆交通而形成的城市,又分陆路、水路、运河等,可能因商路变化而兴衰;五、因港而起,因商而兴的沿海港口城市。宁波就属于这最后一类。

历史上多数城市都经历过兴衰起伏,各有自己的坎坷命运。宁波在宋元时期借助海上贸易形成国际大都会,进入鼎盛时期;明清因王朝的海禁和封闭政策而陷入衰退和被迫转型;近代重新对外开放,又受制于上海崛起的影响,在近代化道路上蹒跚而行;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焕发活力,进入新的高速发展期。

将一座城市置于复杂的关系和系统之中来考察。抓住宁波个性,又从中透视城市命运的普遍意义的思考,对以往城市史研究是一个新的尝试。

地方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整理和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建立本土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促进本土文化繁荣。但仅有内部视角,单纯强调本土意识,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也并非宁波文化工程建设的初衷。宁波城市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自我认知空间。

因为城市是在不同的系统中存在,不像乡村,可以封闭自我,满足于乡土意识。城市史不是让人封闭和坐井观天,而是更具自我意识、区域观、国家观和国际观。通过对宁波生生不息又大起大落的历史命运的重新审视,让我们既坚守这座城市的精神,又时刻审时度势,把握自己的命运;既立足宁波,又要具有广阔视野。这应该是宁波文化应有的情怀和品质。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在宁波丰富厚实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宁波考古发掘积累的材料提供了许多可靠的证据。凡论著和文献征引之处均一一注明。在此对同行们为这一研究打下的基础表示感谢。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卷 开放与繁荣:宋元时期宁波港城的崛起

第一章 宁波港城崛起的条件 / 2

第一节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与明州的开发 / 2

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 13

第三节 明州得天独厚的条件 / 18

第二章 内外交通与庆元港的繁荣 / 28

第一节 宋元开放政策的出台 / 28

第二节 内河与外海航线的拓展 / 31

第三节 开放政策下的港城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 44

第三章 明州港城布局与结构 / 52

第一节 明州(庆元)的城市布局 / 53

第二节 三江口港区空间结构 / 73

第四章 国际大循环与国际大都会 / 93

第一节 海内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 93

第二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 / 102

第三节 宋元明州(庆元)城的国际化色彩 / 112

第二卷 国家与城市:明清宁波城市发展的波折与转型	
第一章 海禁政策:明清宁波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 122	
第一节 明清海禁政策 / 122	
第二节 明清海禁政策比较 / 125	
第三节 海禁政策实施 / 132	
第二章 内外动乱与走私港市的畸形繁荣 / 138	
第一节 海禁对宁波沿海居民生计的冲击 / 138	
第二节 海禁与倭寇之乱 / 141	
第三章 沿海边疆化:明代卫所的形成与分布 / 152	
第一节 卫所制度的由来 / 152	
第二节 宁波卫所的分布情况 / 154	
第三节 卫所制度实施的影响 / 158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宁波城市转型 / 167	
第一节 海禁政策下的港口贸易与港城转型 / 167	
第二节 明清宁波城市布局城市建设 / 178	
第三节 本地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 / 194	
第三卷 开放与近代化:近代宁波城市的演变	
第一章 宁波开埠:条约制度与通商口岸 / 206	
第一节 五口通商与宁波开埠 / 206	
第二节 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和宁波的影响 / 209	
第三节 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与宁波商业贸易的变化 / 213	
第二章 上海与宁波:区域视角的近代宁波城市 / 221	
第一节 新的区域城市结构的形成 / 221	

第二节 宁波与上海:以宁波帮为中心的考察 / 246

第三章 近代宁波的城市结构与发展水平 / 273

第一节 近代宁波港的发展 / 273

第二节 宁波设市:宁波城市建置的新篇章 / 283

第三节 近代宁波的港城关系 / 299

第四节 近代宁波的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关系 / 311

第四章 宁波城市近代化: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公共管理 / 326

第一节 近代宁波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 / 326

第二节 公园等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与管理 / 343

第三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宁波公共卫生建设 / 352

第四节 20世纪30年代宁波摊贩管理与市容改善 / 367

第五节 20世纪30年代饮食卫生管理 / 374

第六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疫病预防 / 381

第七节 20世纪30年代前期宁波医疗卫生建设 / 391

第八节 20世纪30年代宁波城市公共建设和管理评说 / 398

参考文献 / 405

后记 / 417

开放与繁荣：

宋元时期宁波港城的崛起

第一卷



第一章 宁波港城崛起的条件

第一节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与明州的开发

一、宋之前宁波地区发展水平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先民居住、生活。1973年11月,在宁波市的河姆渡地区发掘出几千件文物,经过碳—14测定,得出河姆渡遗址的绝对年代为6900多年,该遗址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①1991年,在宁波的象山县塔山遗址出土了一批史前的墓葬及大量器物,其年代距今约6000余年。^②这是继河姆渡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1995年,宁波北仑柴桥镇沙溪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土了罐、豆、鼎、盘等陶器以及大量有价值的陶片。这反映出河姆渡后续文化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特征。^③除了这三处遗址外,在余姚的鲡山、鲞架山,江北区的慈湖,奉化的名山后等地,也都有类似遗址的发现。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和先进的榫卯木作技术。这些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④

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在宁绍平原上就已经有了“鄞”这样的地名。

据志书记载:“夏时有董子国,以赤董山为名,后加邑为鄞。”^⑤但宁波地区的最早的城市则是从句章古城开始的。关于“句章”之名,史书多有记载。

① 陈裕明:《怎知河姆渡遗址七千年?》,《宁波日报》,1987-11-13,第4版

② 《象山出土六千年前墓葬和大量器物》,《宁波日报》,1991-1-1,第1版

③ 《沙溪新石器遗址发掘有成果》,《宁波日报》,1995-1-4,第2版

④ 《河姆渡考古成果将展出》,《宁波日报》,1997-3-24,第8版

⑤ 彭光玺:《中外文化交流博览》,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4,第468页

班《志》云：句章县属会稽郡。《史记正义》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县西一百里。”^①这座城市始建于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4年），终废于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前后历周、秦、汉、晋诸代，其繁华长达800余年。^②从考古发掘出来的城址来看，句章城大体呈不规整的长方形，长约470米，宽120—200米，周长约1200米，面积10万平方米左右。^③之后，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大发展，到秦时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今宁波境内设有鄞、鄮、句章、余姚（一说西汉置县）等4个县，均属会稽郡。鄞、鄮、句章、余姚县治分设于今奉化白杜、鄞县宝幢、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④一带及余姚镇江北。^⑤

秦时，宁波地区已经出现一些贸易及海外交往等活动。鄞县^⑥“建立于秦时，“鄞”为“贸”和“邑”的合体字。“鄞”的来历与当时宁波地区与海外贸易的交往有关。对此，史籍中也曾有过记载，“邑中以其海中货产，方山下贸易，因名鄞县。”^⑦此外，在宁波慈溪的达蓬山、象山蓬莱山等地都曾流传徐福从当地起航东渡日本的传说，并且在今天慈溪三北镇还有一个村叫徐福村。而象山则把徐福东渡的传说列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⑧不管徐福东渡日本的起航地是否真在宁波，但至少有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那时宁波地区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及海上交往活动。历史上的传说往往不是空穴来风，其背后是有一定的依据及事实为支持的。

句章是周代和古越国在浙东的首镇。对于句章，《十洲志》曾记载：“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⑨从秦到东晋，句章是会稽郡出海的重要通道，其港口设在城山渡。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在《句章县考证》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城山渡，其文曰：“古句章县在今慈溪县南十五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故老相传曰，城山旁有城山渡。”

① 冯惠民：《通鉴地理注词典》，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119页

② 谢安良：《句章故城重大考古成果发布》，《宁波日报》，2009-06-24

③ 谢安良：《句章故城重大考古成果发布》，《宁波日报》，2009-06-24

④ 注：在2009年句章故城考古发现之前，一般认为句章县治在城山渡一带

⑤ 浙江地方志办：《浙江分县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9页

⑥ 对于鄞县建立的时间，目前有秦置和汉置两种说法，但多数赞成秦置的说法。

⑦ 转引自：范谊主编：《宁波：这方水土这方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第171页

⑧ 象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 <http://www.cnxsg.cn/gb/nbxs/node1212/node1227/node1454/index.html>

⑨ 转引自杨古城，曹厚德：《古句章城山渡》，《宁波日报》，1997-12-15

①清人胡亦堂曾赋诗咏叹城山渡,其诗云:“闻昔句章县,江城面水隈。如何鸡犬地,一望尽蒿莱。潮汐无时歇,风帆此道开。当年戍守者,凭吊有余哀。”②在今天城山渡之西约数米的旧渡旁还保存有半截石柱,上面依稀可见“信女阮门胡氏喜口水年天灯”的字样,而这正是当年作为航标的灯柱。③从这首诗和残留的灯柱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城山渡港口一带繁荣的景象。

句章古港不仅是古越民出入大海及进行海外交往的重要通道,还因战略地位的特殊而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元鼎六年秋,“徐善④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⑤这时的句章尚属会稽郡,其时为东海沿岸,是楼船军的基地兼军港。《汉书》卷九十五载有“闽越击南粤……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⑥击之。他们出海的港口也就是句章港。《汉书·地理志》中也有过“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⑦而后汉时,桓晔等由会稽浮海去交趾。由此可见当时的句章港船舶之盛,其国际港地位已经显现。

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孙恩农民起义军近20万人围攻句章县城,城破,戍将刘裕迁县治于小溪,并在那里筑句章新城。⑧《浙江通志·宁波府》也对此作了记载:“宋武帝讨孙恩,改筑(句章)于小溪镇。”⑨小溪即今天鄞州区的鄞江桥,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为“四明首镇”,它的西、南、北三面环山,东面是平原,从四明山发源而下的樟溪流到这里,分成两条支流(下江与上河),把整个镇子隔成三个部分。⑩尽管句章县治迁到了小溪,但设在城山渡的港口却没有随县治迁往小溪,直到6世纪,随着句章古港走向衰落,其港口之址才东迁到三江口(今天的宁波城区)。⑪

① 《句章县考证》,《上海宁波日报》,1934-2-7

② 胡亦堂:《城山渡怀古》,光绪《慈溪县志》,第43卷

③ 王结华:《句章故城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第120页

④ 注:余善为闽越王郢之弟

⑤ [汉]司马迁撰,梁绍辉标点:《史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第681页

⑥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中华书局,1977,第120页

⑦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中华书局,1977,第120页

⑧ 周律之主编:《宁波地名诗》,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第469页

⑨ [清]李卫等:《浙江通志》卷四十三《宁波府》“古句章城”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⑩ 蒋晓峰:《古城鄞江话今昔》,《宁波报》,1980-10-20,第2版

⑪ 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第18页

隋朝时,并句章、鄞、鄮、余姚4县为句章县,治所仍设在小溪。^①唐武德四年(621年),废句章县,置姚州、鄞州,这是宁波建州之始。唐武德八年(625年),废鄞州,改置鄮县,县治仍设在小溪。^②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分越州立明州。^③明州的州治设在小溪,自此与越州相分离。

随着明州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州治小溪地处四明山麓,地形卑隘的情况不利于明州的长久发展。为此,在唐长庆元年(821年),刺史韩察筑城三江口,标志着宁波港城的初步形成。这也就是宁波子城的雏形,子城的范围大概在今天宁波的中山公园一带。此时的明州城占地约10公顷,周围有420丈,现存的鼓楼就是当年子城的南门。^④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唐代明州子城墙是在唐代地坪面上开始构筑的,呈梯形。子城墙体黄褐色夯土,外包砖。^⑤城上有供排水水用的窖井与窖沟,城内还设有排水(污)沟。唐代室内地坪是用方砖铺设的,室外地坪则是先用长方形砖砌成六角形,内填入土并打实,面上嵌鹅卵石。^⑥子城内为官府所在,住在城外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平民。唐末,刺史黄晟又在子城的外面筑了罗城(外城)。据《宝庆四明志》记载:“罗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计一十八里。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唐末刺史黄晟所筑。”^⑦罗城的范围基本上今天宁波的环城马路一带。罗城的建立对于保护子城周围的平民以及防御外敌入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梁开平三年(909年)黄晟墓的墓碑上也曾这样写道:“此郡先无罗郭,民苦野居。晟筑金汤壮其海峤,绝外寇窥觐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⑧郭城建立以后,明州城基本上形成了由子城与郭城组成的两重城市格局。这样,宁波的子城、郭城二层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只是这一时期,城墙的建筑还不甚牢固。

在宋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宁波地区的发展是缓慢的,到了六朝之后,特

①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大事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②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大事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江南东道”,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④ 杜建海,戴松岳主编:《鄞州人文读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第103页

⑤ 《宁波发掘唐宋子城》,《中国历史年鉴(1999)》,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43页

⑥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第131页

⑦ [宋]罗潜等撰:《宝庆四明志》第3卷《叙郡下》第1页

⑧ [宋]罗潜等撰:《宝庆四明志》第3卷《叙郡下》第1页

别是在唐朝的中后期,宁波地区的经济发展才有了一定的起色。当然,在农业占主导的经济条件下,水利工程的兴建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州(明州)鄞县东钱湖周围八十余里,自唐天宝开置,灌溉定海、鄞县民田甚多。”^①如果说东钱湖的开凿解决了鄞县东七乡农作物的灌溉问题的话,那么与同时期建设的广德湖则解决了鄞县西七乡农田的灌溉问题。尽管现在广德湖已不复存在,但它昔日为宁波地区农业所作出的贡献依然在宁波现存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光绪三年的《鄞县志》中曾对广德湖予以很高的评价:“广德湖今虽废,而前之利于七乡者,其德其广不可没也。”^②唐大和七年(833年),在鄞县小溪一带还建立了阻咸引淡的水利枢纽——它山堰。唐朝,析明州的“明”字在明州城南、西南方筑日、月二湖。“日月二湖皆源于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经仲夏堰入南门,一自大雷经广德湖入西门瀦为二湖。”^③日、月二湖的修筑,使得宁波城的水系与周边的水系连成了一片,进一步便利了宁波城市的水运交通。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宁波地区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越窑青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越窑过去一般指的是越州(今绍兴)地区,但经考古调查证实,真正的越窑的中心产地是在宁波的上林湖。^④1973年底到1975年间,在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和海运码头一带出土了一批9世纪中末的青瓷器。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对于出土的瓷器做过评价:“浙江宁波出土了七百多件唐代瓷器,其中越窑产品最多……这批越窑产品不仅数量多,器物造型也丰富多样……使我们认识到九世纪中期越窑青瓷的烧制水平。”^⑤

在宋之前,宁波地区的经济以及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就宁波地区的总体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相对于周边的越州而言,宁波还是处于落后。宁波城市化水平真正意义上的大提高及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则是在宋朝,特别是在南宋皇室南下之后。

① 台湾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第306页

② 杨古城,曹厚德:《四明寻踪》,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第203页

③ 王国维:《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第2册,台北:大通书局,1976,第552页

④ 林士民:《宁波考古新发现》,《宁波文史资料》第2辑,第73页

⑤ 林士民:《宁波考古新发现》,《宁波文史资料》第2辑,第74页

二、北方人的大量南迁与明州地区的开发

明州地处长江以南,东海之滨,在这块土地上,尽管在 7000 年前就已经有河姆渡人在余姚江边生活及居住,他们那时已经懂得钻木取火,学会了种植庄稼和渔猎技术,甚至开始了原始的航运业。但就明州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直到唐朝初年,相比于中原,甚至邻近的越州,明州地区是很落后的,还是一个蛮荒之地。就连今天市中心的三江口一带都未成型,那时由于土质柔软,尚处于沼泽状态。然而,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在唐中后期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北宋时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而到了南宋,特别是宋室南渡后更是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南迁的北方移民及其在明州地区的开发。

纵观中国的移民史,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有三次,即西晋永嘉之乱后、唐天宝安史之乱后和北宋靖康之乱后。但前两次北人的南迁过程中,真正迁到明州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北方人大量迁往明州是从靖康之乱开始的。^①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南迁中,一次比一次规模要大。安史之乱(755 年)后,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这样说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②这一时期迁到会稽一带的也比较多,《旧唐书·鲍防传》对此作了记载:“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屯会稽者如集芥之集渊藪。”^③建炎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藪,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④建炎三年(1129 年),宋高宗为躲避金兵,带着大批随从人员从越州逃到明州,后在明州登舟下海,“诏止亲兵三千自随,百官有司随便寓浙东诸郡”,^⑤其中有一些人则长期居住在明州地区。

南下移民在明州地区的分布极其广泛,不仅出现在明州的大陆地区,就连明州及周边的岛屿上也有一些移民定居。河南人郭维也迁居到昌国县(今属舟山)。^⑥据记载:唐开元年间明州有户数 42200 户;北宋明州户数为:主户

① 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 36 页

②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第 573 页

③ 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第 573 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建炎三年二月庚午,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 5037 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建炎三年十二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 1162 页

⑥ 吴松第:《宋代靖康之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浙江学刊》,1994(1),第 101-106 页

10870户,客户 16803 户。其中主户占有土地,要纳税;客户不占有土地,也不要纳税。到了南宋乾道四年(1168 年),明州有主户 104725 户,客户 31347 户。^①从这则数据中可以看出北宋年间到南宋这段时间,明州地区人口增长迅速。而人口的增长则与北方人的南迁有很大关联,就连宋代的史书在记载人口时,也开始把人口分为主户及客户来统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这时南迁明州人数已达到一个比较大的量。

在其他的时间段里迁往明州的北人规模往往很小,呈现陆陆续续的状态。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移民可分为国家政权组织的移民和自发的无序的移民两种。前者包括政治性移民、军事性移民以及经济性移民;后者主要指的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移民。^②北方这些自发的移民往往是因为战争、灾荒、生计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选择迁至相对安定的南方。《隋书》曾这样描述江南的情况:“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之患。”^③明州亦属于江南之地,尽管其位置比较偏,但由于其地处东海之滨,地位依然比较重要。《乾道四明图经》在谈到明州的地理位置时则借用《后汉志》说:“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④

实际上,北方人的每次南迁与明州地区的开发都是同步的。唐宋之际,明州逐渐成为南迁流民青睐的择居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与明州地区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从今人所编写的《小港镇志》、《浒山镇志》、《泽山村志》等乡镇、村志的起始时间来看,多是在社会动乱或朝代的末期,而这些村镇多数是从唐宋之际开始的。^⑤在这些南迁的北人中,不仅有普通的百姓,还有一些颇有学问的士人及达官贵人。此外,一些在宁波地区为官的外乡人,有的长期在此地居住,随着子孙的繁衍,逐渐成为宁波地区的大家族,有的被载入《甬上族望表》。

①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284 页

② 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第 490—496 页

③ [宋]张津等撰:《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清咸丰四年刊本,第 3 页

④ [宋]张津等撰:《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清咸丰四年刊本,第 3 页

⑤ 《乡镇志、村志、村史出版情况》,载宁波史志网

蒋氏是周公的后裔,《左传》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蒋氏开始主要居住在北方,经过多次迁徙,到五代时,有个名叫蒋显的人任四明盐监官,自此就居住在明州城内采莲桥(地在城西南日、月二湖之间),由于后代人文蔚兴,后逐步发展成为甬上望族。宋代蒋氏科第之盛并于楼(钥)、史(浩)等大家族。^①位于宁波海曙区桂芳巷17、18号的桂花厅是宁波老城区为数很少且保存较好的明代建筑之一,此建筑原系甬上望族倪氏介石园内花厅。倪氏自宋移居明州,到元朝时家产已很富有。^②

从明州一些家谱中依然可以看到由北方迁徙到明州的记录。据《慈溪田胡胡氏宗谱》记载:胡氏远祖为帝舜后裔,周代时“封国于陈”,被赐为“胡公”,世居河南。北宋末年南渡到浙东,开始居住在舟山金塘岛,后迁居慈东。^③《慈溪姚氏宗谱》则称慈溪的姚氏始祖于北宋时由和州迁四明慈水金川乡。始祖冕,元季由金川乡徙居慈东德门乡。^④据《社南李氏宗谱》记载:“李氏先世自青州来。宋天禧(1017~1021)年间,名鼎者仕庆元,遂占籍于鄞,居西城社坛桥北。南宋有八叶进士,后迁于奉,复徙鄞,至第十一代分居于筱墙弄口,称‘玉和堂李氏’。”^⑤

随着北方人的陆续到来,明州地区的开发也逐步拉开了帷幕。从北部的平原地带和东部的沿海地区到明州的中心地区——三江口地带,从明州的中心地带再逐步扩散到边远的奉化、象山等地。据考证,唐宋之际,明州不仅新建了一批重要的水利工程,还多次对之前的水利设施进行重修。

到了宋代,地方官府又多次组织乡民对东钱湖和它山堰进行整修和扩建。经过唐宋的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明州“水难蓄而善泄,岁小旱则池井皆竭”^⑥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明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农作物少受旱涝盐卤的影响,同时也便利了明州的水运交通。南宋人魏峴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一书中曾这样说道:“自唐逮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资,官赋之所出,家饮清泉,舟通物货,公私所赖,为

①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二册《西周史》,台北:华冈出版社,第76页

② 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委编:《甬城街巷》,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第35页

③ 《200多年的观祖桥修竣》,《宁波晚报》,2010-2-5,第21版

④ 王载芳等纂修:《慈东姚氏宗谱》,1931,敦睦堂木活字本

⑤ [清]徐兆昂《四明谈助》上,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第128页

⑥ 张津等撰:《乾道四明图经》,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0卷